

評介陳金鳳《魏晉南北朝 中間地帶研究》——淺談 「甌脫」的經濟價值

江宜頤^{*}

書 名：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

作 者：陳金鳳

出版地點：天津

出 版 者：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 年 5 月

頁 數：244

關於「甌脫」一詞，最早始於《漢書·匈奴傳》的記載：

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眾臣，或曰：「此棄地，予之。」¹

從上述所引之史料加以分析，「甌脫」指的乃是兩國之間的三不管地帶，而並非如字面般「棄地」的不毛之地。這在遼耀東

^{*}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歷史科教師

¹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94，〈匈奴傳〉，頁 3750。

的〈試論漢匈之間的甌脫〉一文中即有詳盡的論述，²於此不再贅言。

以地理學對疆域的概念而言，此類型的三不管地帶，多半出現在交通不便或是兩國之間天然界線不明確之處。³而《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一書中所謂的「中間地帶」，自秦嶺到漢水中游地區而言，基於古代運輸條件的考量，其複雜的山嶽地形，正好造成與其他地區的往來不便；至於淮河兩岸即為廣大的平原地區，則是地表缺乏具起伏的標的物以分隔兩個不同政治勢力的範圍，自然滿足了後者的條件。

過去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或緩衝地區的研究，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在談論天下州郡形勢的部分即有所涉及；而今人的研究成果，則以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⁴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⁵周一良〈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⁶和〈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⁷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⁸田餘慶〈北府兵始末〉、⁹史念海〈論我國歷史上東西對

² 遼耀東，〈試論漢匈間的甌脫〉，收錄於《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大圖書，2000），頁 302-334。

³ 沙學浚，《地理學論文集》（臺北：台灣商務，2000），頁 93-97。

⁴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錄於《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36-72。

⁵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錄於《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93-155。

⁶ 周一良，〈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收錄於《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75-82。

⁷ 周一良，〈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收錄於《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101。

⁸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收錄於《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92-122。

⁹ 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收錄於《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

立的局面和南北對立的局面〉、¹⁰胡阿祥〈東晉南朝的守國形勢——兼論歷史上的南北對立〉¹¹等人專文的研究成果為著。不過若觀察上述的論文，多半為單篇且專注於討論某一主題之上，例如陳寅恪與傅樂成專談荊州位處長江中游對於下游揚州的地形優勢，其荊州乃為攻略或防守江東前哨的說法，在魏晉歷史地理的研究上，得到了許多迴響，並成為治魏晉南北朝史者，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念；¹²唐長孺、田餘慶論述南北朝政府對江淮一帶流民集團的招撫或處理，使後人對於魏晉南北朝地方勢力與政權強弱遞嬗的相互關係，有更進一步的瞭解。¹³

但其中並沒有出現一本有系統且全面性的討論兩個對立政權間甌脫地區的專書，此點就顯示出了《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這本書的特色。本書在資料的引用上，羅列了許多關於甌脫的研究論文，給予了相關主題的研究者一個相當具實用性的參考價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亦解決了一個前人研究中未處理的問題，即「甌脫」的範圍究竟包含哪些地區？陳寅恪與傅樂成談荊州地勢險要，但並未肯定魏晉南北勢力在相互對峙時，兵家必爭之地僅限長江中游以及漢水流域的荊州一地；至於唐長孺和田餘慶論南朝和北朝雙方對於江淮流民集團或地方勢力的爭奪，

2004），頁 329-378。

¹⁰ 史念海，〈論我國歷史上東西對立的局面和南北對立的局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陝西，1992），1992年，頁 57-112。

¹¹ 胡阿祥，〈東晉南朝的守國形勢——兼論歷史上的南北對立〉《江海學報》，4（南京，1998），頁 65-73。

¹²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頁 36-72；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頁 93-155。

¹³ 周一良，〈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 75-82；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頁 92-122。

其所謂的「青齊」¹⁴和「北府」¹⁵的範圍，也是集中在淮河下游的兩岸地區。有關各政權在這個地區競爭的史料，則見於〈宋書·州郡志〉：

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此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吳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晉末遂割丹陽之于湖縣為淮南境。¹⁶

面對資料如此零碎的狀況下，本書作者利用自三國到南北朝末年各政權對甌脫的爭奪狀況，發現西迄隴右、雍州，中有荊州，東至淮南淮北，都有南北對峙、激烈衝突以及羈縻地方勢力的痕跡。進而使作者得出結論，即魏晉南北朝南北政權作為緩衝、防禦或攻略基地的甌脫，應被定位在秦嶺淮河線兩側的帶狀地區。¹⁷此一研究成果，對於處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地理以及政治、經濟局勢上的變化狀況，可說是極為具體且相當帶有參考性的論說。以政治地理學的觀念而言，當一個地理區為兩個實力相當的政權所分割時，領土重要性不是發生在其領內，而是兩個勢力相碰撞的緩衝地區。¹⁸陳金鳳對於當時甌脫的看法，亦抱持著這樣的概念。其認為南朝或北朝政權彼此之間的消長，與這條帶

¹⁴ 唐長孺，〈北魏的青齊土民〉，收錄於《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93-94。

¹⁵ 田餘慶，〈北府兵始末〉，頁 331-337。

¹⁶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5，〈州郡志〉，頁 1033-1034。

¹⁷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18-20。

¹⁸ 沙學浚，〈地理學論文集〉，頁 180。

狀地帶有著非常大的關係；其政權的強弱，與其政府夠在鴈脫控制多少的勢力範圍，進而也影響了對外政策的執行。南北朝彼此之間對鴈脫地區所進行的戰爭，目的不完全是要消滅對手，而是為了作為長時間和平對峙期間的防衛前哨與談判籌碼。作者以劉宋對淮北的經營為例，認為劉宋的統治者相當瞭解當時南北均勢的狀態難以突破，遂而以淮北作為北伐河南地區的前哨站，試圖在長期對峙下取得優勢。¹⁹

雖然說本書在界定魏晉南北朝的鴈脫地有著一定的具體成果，然而本書事實上亦存在著些許缺失之處。首先是部分筆法、引述以及用詞的問題。關於書名中的「中間地帶」一詞，作者陳金鳳乃是認為若以「邊地」視之，是一種中央對地方的觀察角度，但以魏晉南北朝的情形而言，除了西晉有出現短暫的統一，其餘時間均無法出現一個完整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即便是東晉南朝多被奉為正朔之所在，也不過是南北分立中的一個政權罷了。故在這種長時間分裂的態勢下，以中性的「中間地帶」來作為秦嶺淮河帶狀區域的名稱，是較為合適的。²⁰然此一說法讓筆者感到相當不解，關於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區或是三不管地帶，以「鴈脫」一詞為名，無論在《史記》和《漢書》當中，皆已多次出現。這樣的現象在本書的註釋中，作者也表達贊同之意，認為「鴈脫」與「中間地帶」在字義上是相同的。²¹因此作者特創「中間地帶」一詞，實際上是略顯多餘。

另外有關於談論南北朝對於鴈脫內少數民族的政策，以及鴈脫的經濟意義上，作者仍然將其固定在唯物史觀框架中。南北朝

¹⁹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88。

²⁰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14-15。

²¹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14。

各政權與管理甌脫的將領們，依舊被視為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的地主階級；至於少數民族和甌脫中的流民們，則又被歸位於受壓迫的勞動階級。

本書最後缺點是在於整體論點處理的問題。如前所述，本書系統化的整理了有關魏晉甌脫研究的命題和相關二手的研究資料，進而使得本書具有多樣的參考性，然而這樣的特色，事實上也造成了作者在自身創見方面的不足。本書既名為《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其必須處理和融合的主題也相當多元，包含了歷史地理、政治史、軍事史、民族史以及經濟史的範疇。本研究之成果在於明確規劃出魏晉時期的甌脫範圍，故而在歷史地理的主題上處理得相當完善，但是其他主題之獨創性就明顯薄弱許多。尤其是第三章〈中間地帶與東晉守國〉的部分，作者認為東晉將國防主力集中在壽陽與泗口一帶，目的是為了控制荊州以及鞏固淮河沿岸的防衛；另外在戰略方面也以「守江必守淮」為主。²²這樣的一個論點，在田餘慶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有關郗鑒以流民帥身份經營京口駐防地的部分，大致上是吻合的。²³另外一個有關東晉守國的策略，陳金鳳提出了荊襄經略的論調。其重點放在東晉對於荊州地區的經營，是為了加強下游揚州地區的防禦，因此在都督的遴選上，必須以實力考量為主。書中以桓冲為例，認為東晉政府依然選擇桓氏家族子弟，是基於其當地勢力雄厚的結果；並且認定這樣在荊襄的經營，也為日後淝水之戰的勝利奠下一部份的基礎，而不完全是陳郡謝氏的功績。²⁴同樣的，在《東晉門閥政治》中〈陳郡謝氏與淝水之戰〉這一章也有

²²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72。

²³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73-76。

²⁴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75-78。

著幾近相同的論述。²⁵

從這樣的結果來觀察，有關魏晉鵝脫的研究，在許多方面都已達到一個飽和的狀態。那麼究竟還有什麼相關領域與主題可供開拓？其實這個問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間地帶的經濟考察〉可窺探出一些解答。本書在論及魏晉鵝脫的經濟問題時，著重的部分在於農業、水利以及商業互市上；²⁶然而作者似乎忽略了當時經濟運作中，金屬貨幣所扮演的角色問題。

貨幣的使用，在中國歷史上擁有甚為長遠的傳統。秦代半兩、漢時五銖，為貨幣的標準化首開先例，也使中國的貨幣經濟進入了另外一個進程。然而隨著東漢末年政治局勢的轉變，貨幣經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頓挫。但是就根本來說，貨幣經濟並非完全消失，應該視為相對衰落的情況。

至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4 年），隨著政治、社會秩序的逐漸穩定，貨幣經濟不僅恢復了原有的景況，甚至有急速膨脹發展的跡象。士族爭先恐後的捨本逐末、瘋狂的囤積財貨，西晉魯褒的《錢神論》正是此時期貨幣經濟情況一個極為貼切的描述。永嘉之禍後，南北分裂，貨幣經濟的發展也衍生成兩個方向；南方自東晉開始，雖然時有內亂外患的威脅，但與北方比較之下，是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上，因此在城市經濟和商業區域的發展上，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這樣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貨幣的使用、發行與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到了南朝，貨幣又再度進一步發展。兩晉在貨幣的使用上，基本是沿用漢五銖錢，本身並沒有鑄幣的紀錄。然而自劉宋開

²⁵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頁 163-179。

²⁶ 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 205-231。

始，南方的社會和商業持續穩定的成長，貨幣鑄造的需求也突顯出來，因此宋、齊、梁、陳四朝，都有鑄幣的紀錄。²⁷在發行和使用而言，南朝雖然重視錢幣的功能及其所產生的貨幣經濟，但常由於私鑄和貨幣供給量不足的問題，苦於幣制混亂的情形中。

恰巧是通貨不足的問題長期困擾南朝政府，進而更顯示了甌脫對其的重要性。魏晉南北朝的銅礦產地，正好是集中在江淮河道沿線之間。從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荊州，一直到下游的丹陽，²⁸為中國中南部地區銅產量最豐富的地區。所以我們根據這樣的經濟視角來分析東晉「守江必守淮」的戰略，自然也就有其合理之處。上述所說的三個地區，正好與秦嶺淮河線的甌脫帶緊密接壤；巴蜀的北方即為雍州與漢中谷地，荊州上方為襄陽地區，丹陽一地再往北方前進即進入淮南地區。以南朝統治者的觀點來看，甌脫地區不僅有國防上的意義，在經濟生產上，又有著防衛銅礦產區的現實層面必須兼顧。單純的從農業、水利的特點來觀察甌脫地區的經濟面並不突出，因為這並非南北經濟活動上的相異點。但若從南朝貨幣供給不足的角度切入，即可明瞭何以南朝亟欲在甌脫地區留下大面積的空白和緩衝區，而北朝則努力予以破壞此平衡的原因了。

除了自南朝貨幣經濟的角度所衍生出銅礦生產確保之問題外，甌脫這類的緩衝地的存在，也間接讓以銅錢為主的經濟體系，在南北朝分裂且相對不穩固的時空背景下，得到部分生存和流行的可能。此一論述的成立，乃是透過北魏孝文帝一朝後南北

²⁷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154-160。

²⁸ 高敏，《中國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 934-935。

兩政權間日益頻繁的互市記錄而來。²⁹關於南北朝間的互市與貿易，主要是位於淮泗汝潁間的緩衝地帶，透過官方使節交聘或民間私自交易的方式而存在。通常是先出現官方互市之後，民間走私貿易便由政府的帶動因應而生。在這樣商品日漸流通的過程中，不但加強了各政權間的經濟聯繫，³⁰亦讓北方各政權更為貼近貨幣經濟的運作模式。因此當北魏於太和十九年（495 年），基於經濟發展進步而欲發行錢幣時，自然會去參照持續發展貨幣經濟，並通過雙邊貿易而使銅錢流入其境內的南朝模式。在此前提下，鴈脫自然極可能成為南朝金屬貨幣流入華北地區和北朝嘗試獲得貨幣經濟資訊的場域。

藉由上述關於北朝貨幣經濟受南朝影響的觀點，那麼「鴈脫」這塊介於兩政權間的緩衝地，對於當於貨幣經濟演變所產生的重要性，便成為值得討論的面向。同時這也反應了《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和晚近與該書同性質的相關研究，仍然多將心力投注於政治史層面的探究。若是能從經濟史或其他論證的取徑或面向切入，勢必能為此一主題的研究帶來更多不同以往的看法。

（責任編輯：林益德 校對：黃于庭、劉世珣）

²⁹ 《魏書·食貨志》載：「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魏收，《魏書》（臺北：鼎文，1998），卷110，〈食貨志〉，頁2858）

³⁰ 高敏，《中國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經濟卷》，頁1096。

